

港澳特區制定五年規劃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體現

——寫在澳門發布「三五」規劃之際



議事論事

王禹

昨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布《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這一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戰略部署，是澳門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引領澳門開啟高質量、多元化、可持續發展新階段的新綱領。

融入國家發展的制度路徑

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一項重要經驗。在西方許多國家，政策常隨政黨輪替而變動和搖擺，國家長期戰略難以落地。中國的五年規劃使得國家能夠以長遠的戰略眼光，統籌協調千千萬萬市場主體和社會活力，「撓起袖子加油幹」、「一張藍圖繪到底」，確保了國家發展的

「戰略定力」與「政策連續性」。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特別行政區被賦予包括廣泛經濟事務管理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涉及本地經濟發展、財政稅收、民生事業和公共服務、產業扶持和財政傾斜等政策和具體實施，都屬於高度自治權的範疇。在基本法裏，沒有講到特別行政區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文件問題。在傳統的資本主義觀點來看，對社會資源的調節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制定計劃或規劃是社會主義制度政策的範疇。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不僅成功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而且還確保了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在「一國」的新時空背景下，「兩制」都謀求創新發展，優勢互鑒，共

同發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既助力國家發展、又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雙向賦能」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制定特別行政區自身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就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的制度路徑。這不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邏輯的否定，而是對「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充分運用。

《國家發展規劃法》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以及根據需要提出的遠景目標的編制、審查和批准、實施及其監督等工作做了明確規定。該法第37條規定：「國家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國家發展規劃法》雖然不放在兩部基本法的附件三在特別行政區實施，但《國家發展規劃法》第37條無疑對兩個特別行政區是有法律效力的。這是國家首次

以立法形式為港澳對接國家發展規劃提供法律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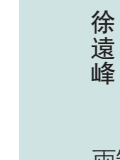
展示建設更美好澳門光明前景

香港、澳門特區制定五年規劃，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在新時代下的生動實踐。它既受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的引領，也要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共同憲制基礎，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中有序落實。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由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國務院編制和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享有廣泛職權，決定政府政策，發布行政命令，是地區首長和政府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特別行政區在行政長官領導下制定並執行政策，管理各項行政事務。制定五年規劃，涉及港澳社會發展的重大方向、政策選擇、公共資源配置，在行政長官統籌下，由政府向社會提出草案，廣泛

徵求意見，形成共識。其中涉及需要制定本地法律的，則由立法會制定為法律。這一過程是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生動體現。2016年和202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經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規劃和第二個五年規劃。第三個五年規劃既是對前面兩個五年規劃的延續和接力，也是在新時代下，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謀劃。「十五五」規劃是接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五年規劃，對港澳而言，是重大機遇。澳門第三個五年規劃的主要內容有「統籌發展和安全」「都市更新」「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科技、教育、人才一體化」「解決民生憂難」，從各個方面展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建設更美好澳門的光明前景。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澳門「三五」規劃擘新局 港澳協同共拓大灣區新機遇



議論風生

徐遠峰

8月18日，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公布第三個五年規劃。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發表談話，肯定這份規劃是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邁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具備「一規引未來」的里程碑意義。站在香港眺望濠江，澳門新一份五年規劃不單為自身未來五年發展繪製清晰路線圖，更為港澳兩個特區探索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治理新模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對接國家戰略路徑提供重要參照，也預示着港澳優勢互補、聯動發展迎來全新窗口期。

「一國兩制」實踐邁入新階段，港澳兩地先後建立長遠規劃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鮮明標誌。回顧過往，澳門先後推出首個、第二個五年規劃，持續以系統化頂層設計破解發展難題，如今第三個五年規劃落地，與香港正積極籌備的首個五年規劃遙相呼應。長期以來，港澳施政多以年度施政報告作為主軸，容易側重短期事務，欠缺跨周期、戰略性統籌。兩個特區相繼搭建五年發展規劃框架，標誌着港澳治思維實現重大轉變：由被動應對眼前挑戰，轉為主動謀劃長遠未來；由單獨考量一城發展，升級為自覺把自身置入國家發展全局定位布局，充分印證「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之下，特區治理效能持續提升，充分彰顯「一國兩制」旺盛生命力。

提升治理精準度與執行力

澳門「三五」規劃認真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立足國家「十五五」規劃部署，緊

扣國家賦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戰略定位，目標明確、抓主務實。整份規劃清晰訂立八大發展目標，鎖定四大核心任務。經濟層面，直面產業結構單一的深層次課題，以四大工程與政府引導基金作為核心抓手，全力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區域層面，持續深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融合。民生層面，首次將都市更新獨立設章，系統布局教育、就業、住房、養老、扶貧各項工作，堅持以人為本，致力提升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整套規劃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並重，舉措具體、可操作性強，不是空中樓閣式的宏大藍圖，而是一張可以逐項落實的「任務清單」。

立足香港視角客觀審視，澳門全新出台的「三五」規劃，在特區長遠發展布局、治理體系建設、區域融合發展三大層面，為香港即將落地的首個五年規劃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踐範本，諸多成熟經驗值得借鑒、擇優吸收。

第一，以規劃明確的「政府引導基金+重點改革舉措」構建「有為政府+高效市場」治理新模式，為高質量發展固本強基。澳門「三五」規劃堅持行政主導優勢，專門設定改革落地機制，以政府引導基金撬動市場資源、引導產業轉型，同時細化重點項目分工與重大改革清單，以頂層規劃統攬全局、以市場機制啟動微觀活力，避免施政碎片化與短期化。這種「規劃引領、政府搭台、市場運作」的治理邏輯，有效提升特區治理精準度與執行力。

第二，緊扣規劃「琴澳一體化」部署，以國家級合作平台突破地域與產業

瓶頸。針對土地稀缺、產業單一短板，澳門「三五」規劃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列為核心任務，明確依託四大標誌性工程——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科技研發產業園、機場橫琴前置貨站，推動琴澳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跳出本地空間局限，為經濟適度多元拓展戰略腹地。

放大灣區對外開放效能

第三，依託規劃定位實現港澳優勢互補，構建大灣區雙輪協同格局。澳門「三五」規劃緊扣國家賦予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定位，聚焦中葡經貿、文旅客展、特色科研轉型，專注打造葡語國家對接內地的精準樞紐。港澳兩地功能互補、資源互通，未來隨着澳門四大產業工程落地、琴澳人才產業平台成型，可形成「香港科創金融對外輻射、澳門中葡平台精準對接、內地空間產業承載」的協同體系，合力放大灣區對外開放效能。

當前國家「十五五」規劃已全面推進落實，港澳同處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澳門「三五」規劃正式啟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亦蓄勢待發。兩個特別行政區，同為「一國兩制」下的璀璨明珠，同負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民族復興的時代使命。期待濠江乘風而起，穩步落實各項規劃任務，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突破；亦期待港澳兩地加強互學互鑒、深化協同聯動，各自發揮獨特優勢，在大灣區建設中雙雙打開發展新空間，攜手為強國建設、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港澳力量。

電影《四渡》帶來的啟示



青評後浪

李宇陽

近期上映的一部「紅色電影」：《四渡》，讓筆者略感意外。無論是故事選材，戲劇張力，還是敘事手法，拍攝畫面，均值得推薦。該電影以紅軍長征時期著名的「四渡赤水」為核心背景，將這段家喻戶曉的戰略轉折，轉化為一部兼具軍事智謀博弈、極限生存考驗與個體命運抉擇的現代歷史史詩。

赤水滔滔，精神長流，在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電影《四渡》的上映不僅可以讓觀眾重溫那段驚心動魄的史實，更加了解到紅軍是如何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生死危局中絕處逢生，自強不息。事實上，「四渡赤水」這場軍事奇跡及戰略轉折，從來不是單一個人的功績，而是全體革命者於絕境之中同心協力、永不言棄的集體精神。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剛剛經歷湘江戰役的慘敗，從出發時的8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部隊疲憊不堪，彈藥糧草匱乏，同時又要面對40萬各路敵軍層層圍堵，前路充滿迷茫與不安。因此，面對第5次反圍剿的失敗與長征初期的被動，在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攸關之際，遵義會議召開，通過這次自我革命，糾正了當時「左」傾教條主義者的軍事指揮錯誤，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隨後在毛澤東等人的軍事指揮下便展開了靈活機動的「四渡赤水」戰役，徹底擺脫了敵軍的圍追堵截，扭轉了長征初期的被動捱打局面，成為世界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

此外，電影《四渡》借助三維地形、動態行軍圖示等手段，清晰展現了「四渡赤水」中每一次軍事行動的戰略意圖、敵我態勢與兵力調動。電影中有一幕令筆者記憶極為深刻，193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四川古

蘭縣召開白沙會議後，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提及「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這份文件統一全軍思想，提振全軍士氣，解釋放棄北渡長江計劃的原因，並首次系統提出紅軍「經常轉移作戰地區」的靈活運動戰略，為隨後的「四渡赤水」戰役奠定了重要的軍事思想基礎。

在前進中實事求是

事實上，這種「不唯書本、不唯定式、只唯實際」的科學態度，也是如今正確政績觀的核心要義之一。電影《四渡》清楚告訴觀眾，克敵制勝的勇氣關鍵來源於實事求是，並因時制宜地破解僵局。面對土城戰役的失利，以毛澤東為首的革命領導人打破常規，果斷改變既定的行軍路線，調頭西渡赤水，而這種敢於直面自己、否定自己、並因時而變的決策勇氣恰恰是「四渡赤水」成功的精髓所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要盡可能地保持困境不低頭、遇事敢變通、遇事敢擔當的這種革命精神。

筆者認為電影《四渡》展現了極高的工業化水平與敘事風格，戰鬥場面捨棄了過度誇張的特效，轉而採用寫實、逼真且具壓迫感的鏡頭語言，向觀眾展現革命時期的信仰與傳承。電影中的決策者們並非擁有預知能力的「神」，而是需要在資訊極不對稱、內部意見分歧與外部強敵壓境的巨大壓力下，做出艱難決策的凡人，同時透過基層軍官的悲歡離合，刻畫了他們面對犧牲時的沉痛與堅韌，賦予了這場偉大轉折真實且震撼的重量。《四渡》無疑是一次傳統題材的現代化重構，更是一部值得走進影院細細品味的佳作。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秘書長

北都辦學潮來臨 審批標準需對接AI新時代



教育思考

鄧飛

北都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布局，規劃可容納龐大人口，隨着創科產業持續進駐，大量人才攜同家庭遷入，勢必帶來極其龐大的教育需求，新一輪「建校潮」已然在望。當前香港教育界正面對兩重現實處境：一方面，面對出生率下滑帶來的縮班壓力，教育系畢業生求職困難，不少年輕準教師面對入行難題；另一方面，北都建設又為新一代教育工作者打開全新的職業舞台，我多次呼籲新晉老師不妨將北都都會區視為職業發展的重要方向，投身這片正在崛起的教育新土地。

面對北都這幅宏偉的發展藍圖，社會上不乏討論，也有聲音質疑其究竟何時才能真正落地兌現。但北都建設並不只是政府的事，要確保北都都會區真正能落到實處，除了需要政府的藍圖，也需要業界主動參與，腳踏實地行動起來，透過務實的實踐推動願景變成現實，以各

環節的制度優化、人才儲備，加快北都教育生態成型。北都的建校潮不是簡單興建一批校舍樓宇，更不是把舊有辦學模式直接複製搬遷到北都，這是一場與科技浪潮同步的教育革新，我們要在建設新校的同時，回應AI時代對教育帶來的顛覆性重塑。

適應未來社會發展要求

真正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的關鍵問題在於：當AI已經深度衝擊整個教育生態，我們審批開辦新學校的評判標準，是否也應該與AI時代接軌？回顧過往，香港審批新辦學校，一向會參考多項傳統指標，例如區域人口比例、學齡兒童數據，以及申請辦學團體積累的辦學經驗、過往辦學往績等等。這些舊有的審批標準當然有其價值，人口數據幫助我們評估學位的客觀需求，成熟的辦學經驗是學校穩定運作的重要保障，這些基礎條件絕對不能丟棄。

但僅僅依靠這些舊標準，已經遠遠不

足以應對當下的教育變局。如果我們仍舊完全沿用前數字時代的評估框架去審批北都的一批新學校，就算校舍嶄新完備，也有可能建設出一批只能適應過去、卻跟不上未來的學校。

在AI科技席捲教育的大背景之下，新學校的核心價值，歸根結底落在兩大教育板塊：一是面向學生的成長輔導教育，二是面向未來的知識技能教育。這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人工智能可以高效處理知識傳授、資料整理、習題訓練等工作，卻無法取代對學生人格培育、情緒支援、價值塑造的成長輔導；與此同時，知識技能教育也不再是灌輸固定的舊知識，而是要教導學生懂得善用科技工具，培養思辨、創造、解決問題的能力，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要求。

因此，審批新校之時，我們不能只看硬體條件與過往經歷，更要追問辦學機構：自身的教育理念，如何充分體現成長輔導與知識技能教育這兩大核心？更重要的是，這套教育理念不能只停留在口號與文件之

上，能否切實落實到學校日常運作的每一個細節：從課程設計、課堂教學方法，到考試與評估機制，再到課外活動、輔導支援等課堂之外的全人教育環節，都要有具體可執行的方案。

我們這一代教育工作者，大多成長於前互聯網、甚至前數碼時代。過往行之有效的成長輔導理論、教學技巧與實務經驗，是寶貴的財富，但也在被AI科技時代快速衝擊。過去積累的經驗，未必完全適用於當下這一代伴隨數碼工具成長的年輕學子。老一套的教學思路，容易出現跟不上學生思維模式、跟不上社會變革的情況。教師的角色正在發生轉變，不再單純是知識的傳授者，更要成為學生的引導者、陪伴者，引導學生善用AI，同時防範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守護學生的心理健康與人格成長。

更新制度標準契合時代發展

北都即將迎來的新一輪建校潮，恰恰給予香港教育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我

們不只是在興建一批學校，更是在搭建適合AI時代的全新教育樣板。舊區學校改革往往受制於積累多年的體制慣性，而北都的新校，可以從一開始就把AI時代的教育要求納入制度設計。相關部門在審批北都都會區新辦學校的時候，整套審核標準能不能真正回應AI對教育的重塑要求。除了人口、土地、辦學團體經驗等傳統維度，應當加入針對成長輔導、AI時代知識技能培育的審查維度，檢視辦學方的理念、課程、評估體系、師資裝備，是否已經做好迎接科技浪潮的準備。

北都的教育願景，不能只停留在足夠的學位數量，更要追求高質量、面向未來的教育內涵。與其等待大環境自行演變，不如借建校潮的契機，主動更新制度標準。不僅為大批新入職的教師提供就業發展的新天地，更為香港的下一代，為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進駐北部都會區，要打造真正契合AI時代發展的教育土壤！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